

中越两国农业制度变迁的历史考察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

李 放 (越)何文九 杜春林

(南京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中越两国建国以来的农业制度都经历了从农业集体化、家庭承包制到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变迁,存在着诸多的相似之处。本文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考察了中越两国建国以来农业制度的演变历程,发现:中越两国农业制度的变迁是在特定的背景下由政府所主导的;新旧制度间形成的断裂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关键节点不仅是连接新旧制度的纽带,更是推动新制度形成的动力;新制度的形成还有赖于行动者的实践支撑以及制度自我强化机制发挥作用。

【关键词】中越两国;历史制度主义;农业制度;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6)03-0083-08

Study on the Agricultural Institutional Change of China and Vietnam

——Based on The Analysis Paradigm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LI Fang (VIE)HA VAN CHIN DU Chun-lin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Abstract: From the state founding to the present, the agricultural system of China and Vietnam had changed from agricultural collectivization, the household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to the agricultural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there are many similarities.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to in-depth analysis and explanation of the two countries agricultural system evolution from the state founding to the present. The study found that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can reasonable explan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system vicissitude in the two countries. Agricultural institutional change is often dominated by the state; Agricultural institutional change also needs certain driving factor, while the Cirtieal junctures is not only a connection between old and new system link, but also pushing power of new institutional form. In addition, 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system depends on the practice of the actors and system self-reinforcing mechanism.

Key words: China and Vietnam;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agricultural system; institutional change

中越两国从建国至今农业发展大致经历了极为相似的三个阶段,一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集体化农业。中国(1949-1978年)与越南(1945-1981年)在建国初期都逐步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并在此基础上发展集体化农业,农业生产“一大二公”;二是改革初期推行的承包制农业。计划经济以牺牲农业生产的效率为代价,很难适应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中(1978-2007

【收稿日期】2016-05-22

【作者简介】李 放(1963-),女,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保障;

何文九(HA VAN CHIN)(1975-),男,越南籍,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杜春林(1989-),男,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年)越(1981-2002年)两国开始了农业承包制的改革,释放了农业生产的活力;三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农业专业合作化。承包制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但却将市场和自然环境带来的风险转移给了农民,降低了其抵御风险的能力,农业合作化成为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在21世纪初,中(2007年以来)越(2003年以来)两国相继都将建立农业专业合作社提上政策议程。从中越两国相似的农业发展脉络是否可以窥探农业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农业政策调整与制度变迁对两国农业发展具有哪些深远影响?本文试图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探寻以上问题的答案。

一、历史制度主义:基本观点及契合性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研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现象就是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政治学的兴起。而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各大流派中,真正从政治科学的传统中生发出来,也是最早具有方法论意义并产生重大影响的就是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①。1992年,Thelen的论著《结构化政治学:比较分析中的历史制度主义》率先为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形成与总结工作做出贡献。Thelen第一次提出历史制度主义,并对其进行了理论阐述^②。之后,历史制度主义作为一种分析范式获得了巨大发展。历史制度主义将“制度”界定为“嵌入政体或政治经济组织结构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程序、规则、规范和惯例”^③。通过批判传统的宏观理论和微观理性选择范式,历史制度主义试图从中层理论的角度重构政治科学,即通过中间层次的制度来联结宏观层面上的社会经济背景和微观层面上的政治行为^④。作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历史制度主义的真谛在于从制度与观念之间的结构性互动中分析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⑤。尽管历史制度主义在阐述制度生成过程中强调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但关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诸多研究也表明:作为一种理论分析范式,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的制度生成、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不仅仅是外在环境变迁的单纯反映物,同时也存在独立于外在环境的一面,即制度生成与变迁有着制度自身的独特规律^⑥。事实上,历史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之一,把制度作为自己的核心研究内容,通过关注制度,将理性主义中的“行动者”与结构主义中的“深层结构”联结起来,建立了一种宏观结构—中层制度—微观行动者的解释框架^⑦。

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主要体现在它的结构观和历史观上,在结构观中,历史制度主义一方面强调了政治制度对于公共政策和政治后果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极为重视变量之间的排列方式;在历史观上,历史制度主义注重通过追寻事件发生的历史轨迹来找出过去对现在的重要影响,强调政治生活中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的特殊性,并试图通过放大历史视角来找出影响事件进程的结构性因果关系和历史性因果关系^⑧。事实上,历史制度主义者不仅重视制度也重视历史,John Ikenberry认为历史的动力塑造了国家和社会组织的结构,这些结构进而塑造、限制、抑制社会和政府行为者,并赋予他

① B.Guy Peters.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The "New Institutionalism".London and New York:Wellington Horse,1999,p65.

② Kathleen Thelen and Sven Steinmo.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in Sven Steinmo,eds.Structuring Politics: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C].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2.

③ 彼得·豪尔,罗斯玛丽·泰勒:《政治科学及三个新制度主义》,《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年第5期。

④ 何俊志:《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科学的重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9页。

⑤ 彼得·豪尔,罗斯玛丽·泰勒:《政治科学及三个新制度主义》,《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年第5期。

⑥ 何俊志:《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科学的重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8页。

⑦ 庄德水:《论历史制度主义对政策研究的三重意义》,《理论探讨》2008年第5期。

⑧ 何俊志:《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们能力^①。Paul Pierson 认为历史制度主义既是历史的又是制度的,并强调现实进程的当下含义存在于制度之中^②。要从历史进程中去追溯制度的生发过程。而路径依赖恰恰是“历史”进入历史制度主义的工具^③。

历史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变迁中制度生成、关键节点与路径依赖的论述与中越两国农业制度变迁之间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其一,从中越两国农业制度变迁的环境来看,建国以来历次农业制度的变迁都是在国家主导并推动下的制度生成过程。如前文所述,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国家主导是农业制度变迁的外部因素,不仅如此,国家主导的农业制度变迁在一定程度上还推动了关键节点的形成。其二,制度变迁具有自身的内在规律,即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断裂的关键节点时期是推动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力。其三,关键节点推动制度变迁,在制度形成以后,路径依赖就成为制度变迁中制度的自我强化机制,农业制度一旦形成,便朝着现有的方向发展并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不仅如此,制度变迁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路径依赖的阻碍(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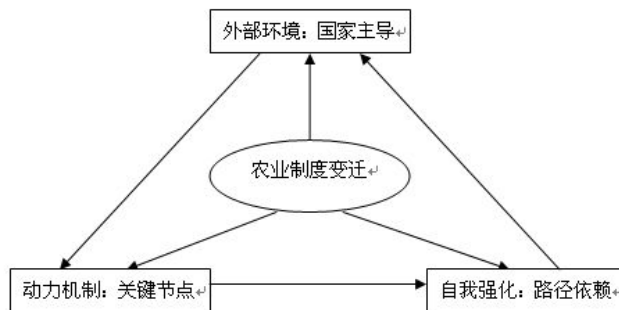


图 1 历史制度主义与农业制度变迁

二、中越两国农业制度变迁过程

中越两国农业制度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时期的人民公社制度到市场化改革时期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再到当前市场经济时期的农业专业合作社制度的变迁历程,具有诸多的相似之处。

(一)计划经济与人民公社制度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中国与越南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受前苏联的影响,逐步建立完善的计划经济体制成为建国初期中越两国社会经济改革的目标和方向,而农业合作化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越南从 1958 年开始在经济恢复和土改完成的基础上开展了合作化运动,到 1960 年底越南北方以飞快的速度基本上完成了农业集体化,合作社达 41.4 万个,有 240 万户农民加入,占北方农户总数的 85.8%和耕地面积的 76%。但规模日益扩大的集体经营和集中统管的行政管理方式,使农业的经济效益越来越差,70 年代越南农业生产陷入停滞。在中国,受 20 世纪 50 年代所选择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超前经济发展战略的制约,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是由以下三个支柱来支撑的:一是政社合一的农村人民公社,二是带有国家垄断性质的农产品统购统销,三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而在农业合作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则是高度集中

① 朱天彪:《比较政治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48 页。

② Paul Pierson. The Path to European Integration: A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t Analysi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996 (2): 123-163.

③ 朱天彪:《比较政治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48 页。

计划经济体制在农村的微观组织基础。

(二)市场化改革与家庭承包制度

计划经济时代,中越两国均走上了农业合作化道路,农业发展受到政府指令的严格控制,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影响农业生产的效率,由此便萌生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特殊历史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越南农业步入革新时期,农业领域的改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实行“三·五”承包制为主要内容(1980—1987年);第二阶段是以完善家庭承包制为中心的农业体制的改革(1988年开始)^①。在中国,尽管人民公社体制在初建时对于农业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恢复起到重要作用,但一大二公、平均主义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1978年小岗村的试点改革拉开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序幕,家庭作为主要生产单位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取代人民公社。

(三)市场经济与农业专业合作社制度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农业生产所面临的风险也不断提高。因此进一步加强农业的抗风险能力成为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以及市场经济持续发展应当关注的重点之一,农业专业合作社开始兴起。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农业专业合作社与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社不同,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早在1996年越南政府就颁布了《合作社法》,2003年又进行重新修订并实施。在中国,为了支持、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国从2007年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明确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

三、历史制度主义对中越两国农业制度变迁的解释

(一)历史背景与国家主导:制度变迁的环境

历史制度主义将旧制度到新制度的变迁过程归纳为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当旧制度面临新的压力时,旧制度内部可能会产生冲突,促使新制度的产生;第二种是旧制度本身可能会激励新制度的产生;第三种是新观念的输入可能会使旧制度下的某些集团去重新思考他们的利益,并引起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和对原有制度的新改变^②。从历史制度主义关于制度生成的三种模式中可以看出,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外在压力是制度生成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一制度生成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冲突模式,外在压力直接作用旧制度,从而旧制度内部产生冲突,促使新制度的产生。中越两国的农业制度变迁都是在特定外在历史环境下农业生产面临困境时,由国家主导的革新。特定历史环境下国家的意志成为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力。

越南建国之初,长期的封建统治和战争制约着农业的发展。从土地制度的变迁来看,1945年八月革命前,占人口总数95%的农民只占有30%的土地,其中占农村人口60%的贫雇农及佃农只占有10%的土地;占不到人口总数5%的封建地主阶级、法国殖民者、教会地主和豪绅占有70%的土地,并依靠对土地的占有通过地租、高利贷、其它附加税和劳役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封建地租一般占收获产品的一半以上^③。新中国成立之前,大部分土地也集中在地主和富农手中,他们占农村人口的比例

① 梁志明:《越南农业改革的历史进程》,《国际政治研究》1996年第2期。

② 何俊志:《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科学的重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8—232页。

③ 林光暄:《越南的土地问题》,社会科学出版社(河内),2007年,第46页。

不足 10%, 却占有 70% 以上的农村土地; 而占农村 90% 人口的贫农、中农和佃农仅占有 20% 左右的农村土地。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垄断严重影响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制约着其它行业的发展, 因此, 无论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还是从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发展及国家建设的角度, 新政府都会致力于改变当前的农业生产环境, 尤其是制度环境的改善, 因此将土地收归国有, 使“耕者有其田”成为这一时期农业制度变迁的主要内容。

从农业合作化向家庭承包制的发展亦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国家主导的变革。1945 年越南独立后, 国家在农村推行集体化运动, 将收归国有的土地交给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中管理和统一经营, 社员实行工分分配, 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这种农业经营体制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致使农业发展缓慢, 粮食生产停滞, 每年都需要大量进口。1976 年南北统一后, 集体化运动在南方的推广遭受挫折。到 70 年代末, 粮荒遍及全国, 食品短缺十分严重, 最终引发了农业改革^①。在中国, 高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化不断强调“一大二公”, 脱离了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 高度集中的劳动方式和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影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农村经济的发展受到约束, 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70 年代末农民的温饱问题还未解决。这些客观历史环境促使政府改革农业制度。

第三次农业制度变迁是在市场化环境下进行的。家庭承包制在农村的推进大大解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 提高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随着农产品的不断充裕, 农产品商品化生产也不断发展, 农民由生产者逐渐转变为经营者, 作为个体的农民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下很难应对诸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这使得农民的生产经营面临更大的挑战。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越南加入了东盟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论坛和世界贸易组织, 并开始履行这些国际经济组织的协定。这对越南农业发展而言就意味着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而在国内越南市场化改革过程对于农业的市场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和考验。因此, 农民开始倾向于组织起来, 开展各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 以便与市场中的各种经济力量相抗衡, 以较低的成本、较快捷的方式整体进入市场。越南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体现了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通过引导非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整合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 实行种养加工、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 提高农业的增值能力和比较效益, 形成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中国当前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以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 通过提供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来实现成员互助目的的组织, 从成立开始就具有经济互助性。2000 年以后,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开放, 特别是加入 WTO 以后, 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 以家庭承包为特征的土地经营制度面临难以适应大市场的困境。以自发联合为特征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逐渐再次兴旺起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界定中可以发现,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 由政府主导推动的互助性经济组织。

(二) 制度断裂与关键节点: 制度变迁的动力

历史制度主义者都将形成之后的制度流变分成了制度存续的“正常时期”(Normal Periods)和制度断裂的“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s)时期”。即一旦制度在政治冲突之中被设计出来之后, 随即就会进入一个正常时期的路径依赖时期, 在这个时期内, 制度与环境之间、制度内部的各项制度之间和冲突的各方之间在既存制度之下都保持着某种平衡; 但是在制度的断裂时期中, 将有可能发生重大的制度变迁^②。“这一制度断裂的‘关键节点’上, 新的制度就建基于各种政治力量的冲突结果, 这种冲突结果的凝固就逐步构成了新的制度。新制度的形成初期之所以被称为是‘关键节点’时期, 一方面是因

^① 中国访越农业考察代表团:《越南农业改革的经验与启示》,《中国农村经济》1998 年第 8 期。

^② Sven Stenmo, eds. 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90.

为此时新制度的形成往往有几种可能,取决于政治冲突各方的力量对比,并且在新制度的形成初期也往往还会受到其它“干扰”因素的影响。而一旦正式走入了某一制度之后,制度的自我强化机制,即路径依赖机制就会使得制度不断得到巩固和强化,直至新的危机的出现^①。中越两国从建国至今经历了三次农业制度变迁,形成了三个较为明显的制度断裂的“关键节点时期”,正是这三个关键节点才促使制度的变迁。

从封建社会土地的地主阶级所有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土地集体所有是土地制度的重大转变,而新政权的建立是这一时期中越两国农业制度变迁的关键节点,政治体制的变迁以及农民对土地的迫切需求打破了制度均衡,推动了制度变迁。中越两国建国前土地高度集中,绝大部分农民不是独立的生产者,农产品主要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从建国初期开始,政府将土地分配给农民,再通过各种互助合作的形式,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下,唯一办法,就是逐渐的集体化,其道路就是经过合作社^②。农业合作化彻底铲除了产生剥削和贫富两极分化的经济基础,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社会落后的面貌。从1952年到1957年,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24.8%,平均每年递增4.5%;而越南北部从1945年前全国水稻平均产量严重不足导致1945年农村饥荒饿死200万,到农业集体化环境下实现农业生产总值从1954-1959连续6年平均增长率达5%的突破。第一个关键节点时期不仅实现了农业制度的变迁,为农业发展提供较好的制度环境,还奠定了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

从农业集体化向家庭承包经营的发展是中越两国农业制度变迁的第二个断裂时期,在越南,其标志性事件是1981年1月越共中央书记处下发了有关实行农业承包制的第100号指示,这一事件成为从农业集体化向家庭承包经营转变的关键节点,在中国的标志性事件是1982年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农业集体化运动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发展,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以及合作社在生产、分配和消费方面无自主权,都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另外,合作社干部队伍素质较低容易导致干群关系紧张;不仅如此,在权责不明的分配体制下,农民对自己的产品没有支配权,促使他们把精力集中到自留地上^③。1965年以后,北越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逐年下降,在南方,集体化农户的收入不如个体农户。农民对农业合作社越来越失去信心^④。这与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的环境极其相似。从农业集体化到家庭承包经营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1981年1月,越共中央书记处下发了有关实行农业承包制的第100号指示,拉开了农业改革的序幕,1988年越共关于农业生产承包制的“10号决议”又取代1981年的“100号指示”。数据显示,从1983年至1987年越南粮食总产量是1700-1800万吨左右,而在贯彻“10号决议”的当年(1988年),越南的粮食产量就一跃而至1900万吨。1989年越南粮食生产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增至2140万吨,出口大米140万吨、成为世界第三大大米出口国^⑤。在中国,1982年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两国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实现了从农业集体化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重大制度变迁。从越南私人经济占社会总产值变化中可以看出家庭承包经营的历史功绩,1960年私人经济占社会总产值的33%,1965年降至9.9%,1971年又降至8.1,直到1985年才开始上升。中国政府不断稳固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地区迅速摘掉贫困落后的帽子,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中国因此创造了令世人瞩

① 何俊志:《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科学的重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31页。

③ 梅拉尼·贝雷斯福德:《越南:过渡中的社会主义农业》,《南洋资料译丛》1991年第4期。

④ Nguyen Tien Hung.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Vietnam: Praeger Publisher, 1978: 57.

⑤ 古小松:《越南的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7页。

目的用世界上 7% 的土地养活世界上 22% 人口的奇迹。

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出现了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农业专业合作社制度变迁的第三个关键节点,在越南其标志性事件是 2003 年《合作社法》的重修;在中国是 2007 年实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随着家庭承包经营的逐步推广,包产到户固然能调动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属于分散经营规模过小,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效益;土地经营的分散化,很难协调农户在商品生产经营中的利益矛盾,难以克服分散农户在商品生产中的盲目性;另外作为个体的农户很难抵御市场风险。1996 年越南颁布《合作社法》,将合作社的发展纳入法制化的轨道,2003 年越南又重新修订《合作社法》,为越南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创造了更良好的政策环境,同时也为越南农业摆脱或降低个体经营带来的效率损失以及市场风险提供了有利条件。合作社对越南的经济和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仅从经济方面来看,2003 年合作社对 GDP 的贡献是 7.49%,其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从 2000 年的 379000 亿盾上升到 2003 年的 453770 亿盾,增长 1.3 倍^①。在中国,关于合作社的立法有 2007 年实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该法旨在支持、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行为,保护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将分散的小农集合起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降低农业市场化所带来的风险。截至 2012 年 3 月,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 55.23 万家,入社农户 4300 多万户,带动的农户达 4000 万户以上,参加合作社农户的收入普遍比非成员同业农户高出 20% 以上。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提高了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促进了专业化、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中国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又一重大制度创新^②。

(三)行动者与路径依赖:制度变迁中的自我强化

路径依赖就是指制度的一种自我强化机制,即一旦某种制度被选择之后,制度本身就将会产生出一种自我捍卫和强化机制,使得扭转和退出这种制度的成本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困难^③。农业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主要是指制度形成之后的自我强化机制,这也为农业制度的实践者提供了行动方向。

农业合作化运动相对于封建土地私有制给广大农民带来的收益更大,同时也有效地解决了政府当局,尤其是统治者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使国家主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持续发展,因此农业合作化制度得到了自我完善,完成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转变。中越两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进程也印证了制度变迁过程中了路径依赖与自我强化机制给行动者带来的行为导向。中越两国的农业合作化的速度是惊人的,从一定程度上看是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路径依赖。1957 年,越南北方只有 21.9% 的农户参加了互助组,高级合作社只有 45 个,到 1960 年,绝大多数农户均已加入了合作社。合作社总数达到 4.14 万个,其中高级社 4400 个,占有北方耕地总面积的 73% 和农户总数的 86%^④。1960 年,高级合作社只占合作社总数的 10.8%,占耕地面积的 15.5%,1975 年分别增加到 90% 和 97.4%。高级合作社规模越来越大,有的是一个乡成立一个高级合作社。1975 年,96% 的农户加入合作社,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⑤。在中国也存在相似的农业合作化之路,农业合作化运动仅用了三年多时间就把以农民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使农村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① 吴远富:《越南的合作社改革初见成效》, http://www.gx.xinhuanet.com/ca/2006-04/11/content_6713278.htm. 中国 - 东盟咨询网, 2006-4-11.

② 乌云其木格:《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五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农民合作社》2012 年第 7 期。

③ 何俊志:《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科学的重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236 页。

④ 陶文集:《越南经济 45 年(1945-1990)》,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40 页。

⑤ 褚文林:《越南农业合作化的历史、问题和展望》,真理出版社(河内),1992 年,第 23 页。

加速了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进程,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成功改造小农经济的一个范例^①。

家庭承包制的发展也遵循类似的路径依赖。在越南,1981年1月越共中央书记颁布了“100号指示”肯定了家庭承包制。家庭承包制的具体做法就是“三五”承包制,即合作社把农作物生产过程中的8个环节分为两部分。耕种、施肥管理、收割等3个环节交由社员承包,整地、种子、肥料、排灌和防治病虫害等5个环节由合作社统一负责。推行“三五”承包制后,过去合作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得到了克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集体的优越性和农民的积极性。到1988年4月,在经过激烈争论之后,越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有关完善生产承包制的第10号决议,核心内容是将国有土地的使用权直接交给农户,取消了在生产环节上对农户承包的限制,生产流程全部由农户自主经营,明确提出了农户为自主经济单位的概念,家庭承包制在改革中不断巩固、完善。在中国,从安徽省小岗村等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实践开始,全国范围内陆续出现了分田到户的包干现象,家庭承包制的优越性不断体现,在实践中也不断强化。1983年中共中央下发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中国实践中的新发展。1991年11月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提出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中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中国政府不断稳固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使广大农村地区迅速摘掉贫困落后的帽子,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

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向农业专业合作社制度的转变可谓“道路崎岖”。市场经济下的农业专业合作社与人民公社化体制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有着明显的区别,是一种带有合作性、自愿性的生产、经营、服务形式。其成立是为了满足农户实际经营发展的要求,而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意识形态影响下的产物,并没有充分考虑农业发展的现实情况以及农民的实际需求。在家庭承包制向农业专业合作社制度变迁的断裂时期,行动者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路径依赖也使农业制度变迁尤为困难,尽管家庭承包制具有自身内在的不足,但也具有一定的优势。中越两国农业专业合作社制度的建立与市场化改革相同步,农业专业合作社制度顺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可以说,越南农民面临严峻挑战的农业经济形势,正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社的有利时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农业产业化经营能够充分地、有效地抓住全球经济一体化给予的机遇,并能迎接其挑战。越南政府在复杂的国家环境下,通过《合作社法》的颁布与进一步修订来逐步完善农业专业合作社制度。与越南类似,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下,中国政府也通过颁布《合作社法》,支持、引导在家庭承包制基础上逐步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四、结语

中越两国农业制度都经历了从农业集体化、家庭承包制到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制度变迁。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来看,国家主导是两国农业制度变迁的外部环境,不仅如此,国家主导在一定程度也推动了关键节点的形成,而关键节点时期构成了农业制度变迁的推动力量;农业制度变迁也受到制度自我强化机制的约束,农业制度的路径依赖虽然在制度巩固和完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在很大程度上也使制度变迁举步维艰。从中越两国农业制度变迁历程还可以看出,制度变迁与经济体制转型密切相

(下转第142页)

^① 闫素娥:《关于20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再评价》,《史学月刊》2012年第7期。